

全球化下中国保税区与腹地经济发展:基于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赵 榄¹,常 伟²

(1.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2. 青岛保税区经贸局,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 WTO,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税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发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商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腹地经济的发展。但是,保税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头分管”的管理体制、“区港分离”的设区原则以及出口导向的国际分工定位,限制了保税区对腹地经济的辐射作用。实践中,应加快保税区管理体制变革,促进“区港联动”,努力提升区内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挥好保税区对腹地经济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保税区;腹地经济;辐射效应;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790.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4-0010-04

一、引言

中国的保税区于1987年年底开始设立,至今共设立了15个保税区^[1]。这些保税区是中国继成功创办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借鉴国际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经验设立的,以减免关税、放宽海关和外汇管制为主要优惠措施,以发展国际贸易、出口加工、仓储和商品展示为主要功能,旨在改善中国投资、建设软环境的特殊经济区域,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一项有效的战略举措。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保税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连接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中国区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06年,全国保税区实现增加值1427.94亿元,同比增长22.68%,呈现“高起点高增长”的发展态势;2006年,全国保税区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达到1090亿美元,同比增长23%,高出全国增长比例2.2个百分点;2006年,全国保税区吸引投资额再上一个台阶,达到125.73亿美元,同比增长25.26%,其中合同利用外资53.5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6.69亿美元^[1]。

保税区作为高度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域,已经越来越成为腹地经济的重要支撑。但是也应该看到,各地保税区在十几年探索过程中,仍面临着“多头分管”的管理体制带来的运营效率低下、“区港分离”的设区原则带来的保税功能弱化以及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带来产业升级滞后等诸多挑战。要进一步提升保税区对区域经济的贡献,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笔者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保税区促进腹地经济发展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中国保税区对腹地经济辐射作用的对策,为中国保税区今后的发展提供思路。

二、保税区促进腹地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保税区主要是通过其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物流集散效应、投资乘数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来影响腹地经济的运行,最终达到加快腹地商贸流通,提升腹地产业结构,增加腹地就业人口,提高腹地技术水平等作用。

收稿日期:2008-04-10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2006JDQY001ZD)

作者简介:赵榄(1983-),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

第一,保税区内优惠的贸易政策为腹地企业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近年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国内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往往只能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于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产品,而企业的利润基本来自于国家的出口退税。因此,出口退税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一般而言,企业的产品只有在货物真正离境后才能获得退税,而船期、运输、通关等因素会相应地延长退税额的获得时间。而保税区在进出口税收方面比照实行出口加工区的相关政策,腹地企业的出口货物只要一进入保税物流园区便可获得退税,从而大大缩短了退税周期,提高了退税效率,有力支持了腹地出口企业的运营。除此之外,在保税区还允许对来自国内外的货物进行二次集并和增值加工,而且在园区内的保存时间没有限制,这也提升了保税区贸易中转的功能,对于促进腹地中转贸易相当有利。

第二,保税区内完备的物流仓储体系可以降低腹地企业物资运输和仓储成本。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运输仓储企业在地理上较为分散,在规模上较为弱小。由于物流设备资源的利用不充分,信息沟通不及时,导致区域物流成本比较高,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通过保税区特有的政策优势,将提供各种特色、具备各种功能的物流企业吸引过来,从而形成物流产业的相对聚集。众多物流企业通过深化分工,可以降低物流的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有助于腹地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物流外包更好地实现专业化。

第三,保税区内大量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腹地企业的发展。一方面,

通过投资形成的初级乘数效应,会刺激贸易、物流和加工等在整个腹地城市群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新派生出来的各种需求,又会进一步带动腹地城市群内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信息服务等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产生二级乘数效应。通过不同层级的乘数效应的放大,能有效促进腹地经济的发展,提高腹地的劳动就业率和人民生活水平。

第四,保税区内高技术企业通过示范和外溢效应,有利于腹地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税区作为国内外众多企业聚集之地,是腹地企业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和管理经验的场所,通过先进企业的技术和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有利于腹地企业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通过与保税区内企业的竞争,会激励腹地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提升管理水平,从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保税区促进腹地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贸易拉动效应为例

在理论上证明了保税区对腹地经济存在贸易、物流、技术等辐射效应,现在进一步利用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广州、宁波、深圳(包括福田、沙头角和盐田港保税区)五个保税区的数据⁽²⁾,实证分析保税区与腹地经济的关系。考虑到文章的篇幅以及保税区相关统计数据获取的难度,笔者仅以保税区对腹地经济的贸易拉动效应为例,探讨保税区与腹地经济的关系。

文章主要采用2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出口总额(Import & Export quota,以下简称I&E)。实证分析中选取1995-2004年为数据样本区间,所有数据来自历年各保税区所在省、市、区的统计年鉴(表1)。

表1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总额(1995-2004)

年份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各保税区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上海	天津	宁波	广州	深圳	上海	天津	宁波	广州	深圳
1995	2 462.57	917.65	637.63	1 243.06	795.69	61 079	30 381	34 989	7 884	36 234
1996	2 902.2	1 099.47	795.86	1 444.93	950.04	104 589	38 749	37 016	11 559	87 208
1997	3 360.21	1 235.28	897.43	1 646.25	1 130.01	177 962	60 759	55 680	20 395.	177 371
1998	3 688.2	1 336.38	973.44	1 841.60	1 289.01	294 004	71 344	40 288	26 951	277 739
1999	4 034.96	1 450.06	1 041.74	2 056.73	1 436.02	4 73808	73 076	47 350	31 672	326 458
2000	4 551.15	1 639.36	1 175.75	2 375.91	1 665.46	7 62345	92 415	47 747	54 991	517 031
2001	4 950.84	1 840.1	1 312.68	2 685.75	1 954.65	886 754	105 641	31 521	59 909	636 837
2002	5 408.76	2 051.16	1 500.34	3 001.47	2 256.82	1 193 782	191 135	39 651	97 918	113 249
2003	6 694.23	2 578.03	1 786.85	3 758.61	3 585.72	2 093 076	339 079	71 618	155 913	178 788
2004	8 072.83	3 110.97	2 109.45	4 450.55	4 282.14	3 083 366	530 306	107 021	228 426	2 524 892

为了确立保税区内进出口额与腹地国内生产总值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具体形式,需进行线型回归分析。为了消除在计量过程中经济变量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引起的不利影响,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将I&E与GDP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出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I&E与LnGDP。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对面板数据LnI&E与LnGDP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在面板单位根检验中运用最为广泛的LLC(Levin, Lin&Chut)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对LnI&E与LnGDP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LLC 检验值	P 值	结论
LnI&E	11.885 6	1.000 0	非平稳
LnGDP	5.331 27	1.000 0	非平稳
LnI&E_1	-2.291 89	0.011 0	平稳
LnGDP_1	-1.917 55	0.027 6	平稳

结果显示,LnI&E与LnGDP的LLC统计的检验值分别为11.885 6和5.331 27,均大于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不能拒绝非稳定和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得出LnI&E与LnGDP是非稳定的序列。由于LnI&E与LnGDP的非稳定性,应该继续对它们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计算,LnI&E与LnGDP的一阶差分

序列 LnI\&E_1 与 LnGDP_1 各自的统计检验值均小于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得出 LnI\&E_1 与 LnGDP_1 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 LnI\&E 与 LnGDP 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并且对他们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序列,即可检验出二者具有协整关系。

采用 Eviews5.0 软件对 1995 - 2004 年的情况进行 OLS 回归分析,分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测算,结果见表 3。同时对个体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得到相应的统计值 $H = 0.35474 < 6.635 = \chi_{0.01}^2(1)$, 检验结果拒绝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选择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表 3 保税区进出口额对腹地经济发展
总体作用回归结果(1995 - 2004)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T 检验值		系数	T 检验值
C	3.258 9	9.523 6***	C	3.241 3	11.973 0***
LnI\&E	0.367 5	16.163 0***	LnI\&E	0.369 0	16.130 3***
\bar{R}^2	0.843 0		\bar{R}^2	0.928 0	

注:*** ** * 分别表示置信度为 99%、95% 和 90%。

从表 3 可知,模型整体通过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 0.843,表明用保税区的进出口额来解释腹地经济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其中,保税区进出口额(LnI\&E)在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达到 0.367 5,并且通过了检验,表明保税区进出口额与腹地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保税区进出口额每增长 1%,就会带来腹地国内生产总值 0.3675% 的增长。因此,保税区内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必将带动整个腹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同时,系统自动生成残差,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对模型残差的 LLC 单位根检验

LLC 检验值	P 值
-2.949 36	0.001 6

从检验结果来看,模型残差的 LLC 统计检验值为 -2.94936,小于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得出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可以说明 LnI\&E 与 LnGDP 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即中国保税区内国际贸易的发展与腹地经济的发展具有共同的增长趋势,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保税区促进腹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一) 保税区推动腹地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首先,“多头分管”的管理体制难以提高保税区运营效率,增加了腹地企业与区内企业的商务成本,不利于提高腹地经济活跃程度。保税区设立后,其运行政策主要由海关总署、工商行政管理居、外汇管理局等“八部委”负责制定,国家并未指定一个权威部门对保税区统一管理,这就造成了保税区内“多头分管”的复杂管理体制。在海关、工商、税务等众多部门的管理下,出台的政策法规往往会出现相互矛盾、难以操作等问题,使得保税区成为一个政策冲撞的“不稳定区”^[2],这势必降低保税区的运行效率,增加腹地企业

与区内企业的商务活动成本。

其次,“区港分离”的设区原则限制了保税区物流仓储中心功能的发挥,不利于腹地港区利用保税区开放的优势。中国设有保税区的 13 个城市都是有港口的城市(其中张家港为河港城市),但是目前保税区基本与港口隔绝,使得港口难以摆脱“辅助港”的地位。这种“区港分离”的设区原则使得保税区的出口加工、保税仓储、物流配送等功能的发挥都无法充分利用港口优势,难以增强商品、资金和信息的聚集和扩散能力,从而限制了保税区对腹地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另外,由于货物不能直接从港口进入保税区,使得保税区的货物进出口流通都要经过港口和保税区两道海关检验手续,导致物流不畅,提高了商品的流转成本,增加了腹地企业的负担。

最后,保税区内大量加工型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低端环节,无法带动腹地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以获取更多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根据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可以分成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所蕴含的价值是不平等的,其中利润最丰厚的两端为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营销与仓储物流,而处在中间段的组装制造生产等工序则利润空间最小。当前,保税区内大量的传统型加工企业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缺乏在上游研发和下游营销仓储等高附加值环节竞争的能力。这些企业在接到庞大的国际订单时,往往与腹地企业联合进行国际代工,从而使得区内和腹地的企业缺乏产业升级和跃迁的外部动力。而这种以低成本为优势的同质化竞争,很容易使企业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当保税区内企业和腹地企业的商务成本逐渐上升、产业升级出现滞后时,这些企业很有可能被另外一些地区和国家内生产成本更低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所取代。正如一些学者指出,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俘获,很容易在市场势力不均衡的网络中,被长期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走“低道路”,其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的努力,都会遭到来自高端企业的阻击,因而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3]。

(二) 保税区促进腹地经济发展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加快保税区体制改革、增强保税区与港口的联动效应、在保税区内大力发展物流仓储和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入手,走出一条适合中国保税区发展实际的改革路径。

第一,改革当前“多头分管”的管理体制,提高保税区运营效率,降低腹地企业与区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成本。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有必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中央、地方二级管理体制和公司化运作的运行机制。在中央方面,由“八部委”多头管理,改为一个职能部门的单一管理体制;地方政府设立区内管委会,代表地方政府行使日常行政管理职能;开发公司则按企业方式灵活运作,负责区内土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

第二,从“区港分离”转向“区港联动”,努力发展国际枢纽大港,促进腹地经济腾飞。在中国改革

开放和发展的新形势下,保税区应积极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发展国际枢纽大港,促进腹地发展“港口经济”。保税区要充分利用港口优势,通过在港口发展贸易、海运、理货、海运代理、货代、仓储、商展、信息、金融等业务,为进出口贸易、国际转口贸易提供便利、优质和低成本物流服务。当前,可选择几个毗邻大型集装箱港口的保税区,实行港区一体,突出口岸贸易、转口贸易和国际物流服务功能,逐步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在这方面,保税区所在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促进港区一体化工作。

第三,保税区内企业应率先向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升级,带动腹地企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腹地经济发展品质。首先,保税区应大力发展现代仓储物流产业,在价值链的流通环节获取更高的利益。要充分发挥保税区免许可证、免配额、免关税以及保税仓储时间无限制的政策优势,紧临港口、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海关、外汇、商检、税务、银行、保险等机构设置完善的服务优势,逐步把区内的企业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转向高附加值的流通环节,从而摆脱保税区内企业和腹地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底层的状况。其次,保税区应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价值链的研发环节获取更高的利益。保税区要顺应中国产业调整和要求,通过出台扶植高新技术的政策,规划出保税区内的高新产业园区,吸引大批本土高新技术企业与跨国公司落户。区内高新企业群通过集群内的技术溢出、人员流动、资源共享等效应,不仅可以提高区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也能对腹地企业技术升级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由上面分析可知,中国各地保税区自设立以来,无论在贸易创造、商品流通,或是在技术外溢、投资拉动等方面都推动了腹地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是由于在全球化分工中中国所处的地位较低,而保税区在自身管理和运行体制上又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保税区在推动腹地经济发展中仍面临诸多制约。实践中,应加快保税区

体制改革步伐,变“多头管理”为“单一管理”,提高保税区运行效率;要积极促成保税区与港区的“区港联动”,推动腹地经济在保税区和港口的联合带动下快速发展;要重新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充分利用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打造物流仓储服务基地和高新技术企业群,逐步提高区内企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动腹地企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注释:

- (1) 15个保税区分别为: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广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海口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宁波保税区、青岛保税区、汕头保税区、深圳盐田港保税区、珠海保税区。
- (2) 由于所有15个保税区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得,而上海、天津、广州、宁波、深圳5个城市内的保税区在地理上涵盖了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区域,并且这些保税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分别达到了所有15个保税区的81%和85%(2002年数据),因此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可作为分析的对象。

参考文献:

- [1] 中国保税区 2006 年主要经济指标[J]. 港口经济, 2007(5): 60-62.
- [2] 成思危. 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 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 [3] 刘志彪. 全球价值链中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提升[J]. 中国经济问题, 2007(1): 9-17.
- [4] GEREFFI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 1999, 48: 37-70.
- [5] KOGUT B. Designing Global Strategies: Comparative and Competitive Value-added Chains [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5, 26(4): 15-28.
- [6] 陶明. 对加入世贸组织后保税区功能转型的思考[J]. 国际贸易问题, 2003(2): 13-15.
- [7] 张辉. 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1): 40-48.
- [8] 乐音鸣. 宁波保税物流园区对产业的促进作用[J]. 发展, 2006(3): 43-45.
- [9] 王萍锋, 戴娜, 陈钧浩. 中国保税经济区发展研究[J]. 经济丛刊, 2006(5): 19-22.

Free Trade Zone(FTZ)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ts Hinterland under Globaliz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ZHAO Lan¹, CHANG W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Qingdao Free Trade Zone Economy & Trade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Qingdao 266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hina joining the WTO,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conomic component of the world. As an open window to the world, Free Trade Zone(FTZ)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stimul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ts hinterland. However,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multi-channel management” system, “FTZ-harbor separation” principles and the long-term export-oriented policies limit the radiation effect to hinterland’s economy. In practice, we should embark on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FTZ’s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FTZ-harbor interaction” and enhancing the FTZ’s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exert a catalytic influence on the hinterland’s economy.

Key words: free trade zone; hinterland economy; radiation effect; industrial upgrading

(责任编辑 傅旭东)